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共同富裕的人民性

张贤明

共同富裕之所以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它是全体人民的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具有强烈人民性的共同富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理应更加深刻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的人民性内涵及其实现方式。

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

共同富裕既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践行,是共同富裕的人民性最为直接的体现。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可见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重要判断标准和可靠着力点。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消灭剥削压迫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行

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

唐铮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抓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出了发展要求,指明了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提出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媒体步入深度融合“深水区”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县级行政单位已基本完成了媒体资源整合和机构建设,建成了2000多家县级融媒体中心。要使地域、发展



扫描二维码 查看理论版更多内容

改革开放、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考量,以共同富裕为责任担当。

共同富裕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现实性前提。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实质上也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如果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那么人理应是切人类历史活动最终的意义载体。共同富裕的人民性表现在它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即它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正因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所以“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促进改革发展成果的有效共享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使全体人民都能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中普遍受益,其人民性内涵与共同富裕的内在价值具有高度契合性。只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才能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利益。人们在普遍而广泛的社会交往与合作过程中共同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共享这些发展成果能够为社会成员进一步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提供动力和条件。在此意义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质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本身是社会成员联结成社会共同体并不断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原因。把人民应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内容上升为人民的基本权利并使其得到法治保障,就是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能够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促进个体利益成长。社会的发展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需要让每个个体都能从改革发展中受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应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依归,但如果仅仅关注社会整体层面上的发展和提升,而忽视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个人全面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可能流于形式,无法真正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在此意义上,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体现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也体现为最大限度地让最广泛的社会个体都能够享受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果。

健全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机制。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改革发展成果有效共享,应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主线,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途径方法,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体制机制的创新。只有如此,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会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密切相关,保障每个社会成员从改革发展中受益,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有效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景,将这种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景贯穿国家治理全过程,必然要求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

鼓励勤劳致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基础和持续动力。勤劳致富不仅可以激发社会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更好更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而且还能体现人民主体地位。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享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这同时意味着社会成员需要承担参与改革发展进程的责任和义务,否则每个人的权利就可能扭曲成坐享其成的特权,失去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持续动力。共同富裕离不开共同奋斗,鼓励人民共同奋斗、勤劳致富,可以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完善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合法致富的法律和社会政策体系。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是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需要全体人民通过劳动来创造。“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劳动致富。鼓励全体人民勤劳守法致富,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能够提高人们的就业创业能力,增强人们的致富本领。当前,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得到历史性解决,相对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要完善社会政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帮扶保障低收入群体,完善兜底救助体系,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景,将这种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景贯穿国家治理全过程,必然要求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

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人民当家作主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一致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也包括民主、法治等多层次多样性的需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过程也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维护和实现自身根本利益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使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原则贯通国家治理各环节,能够保证人民广泛参与涉及共同富裕的公共决策事前、事中和事后所有阶段和全部环节,使实现共同富裕的各项思路举措更加符合民主的原则、更能体现人民的利益与诉求。

强化实现共同富裕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的责任保障。切实有效地贯彻落实体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价值原则的制度体系与政策体系,离不开责任机制的建立健全。现代政治制度的构建倾向于将民主与责任视为互为交叉的制度体系,贵任政治建设有利于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质量,确保责任指向的人民本位,进而在此过程中强化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价值原则的实现。提升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责任性,一方面要实现问责机制全覆盖,通过建构覆盖民主全过程和参与全主体的责任体系,使所有参与主体都能秉持负责任态度参与国家治理全过程。另一方面,通过观念引导和共识凝聚,整合和统一参与目标,做到以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导向,负责任地参与民主全过程、负责任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洞察

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世界民主的“灯塔”,但日趋严重的政治极化却使得这座“灯塔”日益黯淡。所谓政治极化,是指人们的政治态度趋向政治光谱的两极,分歧较大,甚至严重对立,中间温和的政治态度减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分别朝着极右和极左方向发展,民众也日益分裂为支持两大政党的对立阵营。政治极化使美式民主原形毕露,充分显示了它是少数人的民主、缺乏协商的民主、劣质治理的民主。

政治极化削弱美国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础

一般而言,政治参与人数越多,公共决策代表性就越强,也就越接近民主的本质。在美国,人们的政治参与度本来就不高,连影响最大的总统大选,投票率一般仅60%左右,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首长等其他选举的投票率更低。而且美国选举大都实行简单多数的胜选规则,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获胜候选人的选票往往不超过50%。这样算下来,获胜候选人所代表的选民很难超过30%。在此背景下,政治极化使得美式民主的代表性更低,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础更弱,美式民主越来越沦为少数人的民主。

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共和党和民主党长期轮流执政。过去一段时期,为赢得选举胜利,美国两党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都趋向中间化,以争取更多选民的认同和支持。196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独立候选人乔治·华莱士曾说,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没有一毛钱的差别。两党意识形态中间化,也意味着政策主张交集重合较多,这样,政党不仅代表基础选民的意愿,而且反映中间选民的意愿,甚至还要兼顾对方政党选民的诉求。但随着两党意识形态趋向两极,各政党兜揽“基本盘”,越来越代表基础选民的偏好,也就与民主代表多数人的本质要求相偏离。由于美国党内初选制度、安全选区增多、简单多数胜选规则等原因,意识形态越极端的候选人不仅能够在党内选举中胜出,而且往往能够在正式选举中获胜。比如,2016年特朗普打着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政治正确等极端言论,击败了10多名共和党候选人,而且击败了被大多数媒体和民调机构看好的希拉里。政治极化使美国政治人物在政治选举中不愿倾听中间温和选民的声音,更不愿倾听对立政党基础选民的意愿。政党执政后,政治人物或出于选举的考量,或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制定的公共政策往往更加倾向本党核心价值理念,代表支持本党的少数极右端民众利益,而非考虑各方面民意,政党“党派性”取代了“公共性”,公共政策代表性、科学性不足。可以说,政治极化使美国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础更加薄弱和扭曲。

政治极化导致政治僵局和政治瘫痪,降低国家治理效能

民主是治理的重要方式。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美国国会作为立法机构,是重大公共政策讨论和通过的场所,是共和、民主两党斗争的重要阵地,也是两党政治极化表现最为明显的场合。为了不让对方提出的议案通过,两党经常运用非常规手段“阻挠议程”,导致降低国会立法效率,影响立法质量和数量,一些具有前瞻性、持续性的重大公共政策难以出台。同时,在美国,“府会分治”是一种常态,很少出现一个政党同时掌握行政权、立法权的情况。在当下两党严重对立的政治极化背景下,掌握行政权的总统提出的法案很难在国会获得通过,所谓“制衡体制”变成了“否决型体制”,造成严重内耗,甚至导致灾难性的政治僵局和政治瘫痪,影响国家治理效能。比如,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许多政策,都遭到国会的掣肘,出台“慢半拍”;在共和党控制的“红色州”与民主党控制的“蓝色州”极化更加固化的情况下,联邦政府的疫情应对政策遭到反对党控制的一些地方政府的抵制和消解。

政治极化使得政党间民主协商变得更加困难

民主不是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斗争。通过对重大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不断凝聚共识,达成妥协和平衡,是民主的内在要求。美国有协商审议的政治传统,1787年宪法的制定就经过了长达4个多月的辩论。美国立宪者设计的选举人团、参众两院等制度,也内含着协商审议的精神。但随着美国两党走向全面对抗,民主协商也越来越难,妥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协商是为了达成共识,但协商也需要以共识为基础。过去,美国两大政党虽存在分歧,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共识性很强。日益严重的政治极化,使两大政党在诸如非法移民、枪支管控、医保改革、女性堕胎、气候变化等诸多重大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政治斗争更加白热化,几乎没有协商与合作的余地。民主协商的减少,又进一步撕裂社会、扩大对立,使仇视政治升温、政治极化加剧,造成恶性循环。

与西方国家其他政党相比,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组织纪律相对松散。但由于政治极化,美国两党在其各自内部对于重大问题却表现出高度“团结”。国会议员越来越多、也不敢向对方协商妥协,一旦在重大分歧问题上支持对方政党,往往被贴上“投降”的标签,甚至被认为是对选民的“背叛”,在选举中很可能落选。这迫使两大政党议员都不得不以政党划线,在投票表决中只问立场、不问是非。比如,2019年

政治极化使“民主灯塔”日益黯淡

孙存良

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针对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两项弹劾条款,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在弹劾投票中,民主党除个别议员外大都投了赞成票,共和党议员则是“铁板一块”,无人投赞成票。反观1998年美国参议院以伪证罪和妨碍司法公正两项罪名弹劾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分别有10名和5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克林顿无罪。再追溯到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因1972年的“水门事件”,遭到两党的一致批评,最后不得不黯然辞职。可以看出,美国政治极化呈现越来越严重趋势,两党民主协商变得更加困难。

政治极化导致政治僵局和政治瘫痪,降低国家治理效能

民主是治理的重要方式。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美国国会作为立法机构,是重大公共政策讨论和通过的场所,是共和、民主两党斗争的重要阵地,也是两党政治极化表现最为明显的场合。为了不让对方提出的议案通过,两党经常运用非常规手段“阻挠议程”,导致降低国会立法效率,影响立法质量和数量,一些具有前瞻性、持续性的重大公共政策难以出台。同时,在美国,“府会分治”是一种常态,很少出现一个政党同时掌握行政权、立法权的情况。在当下两党严重对立的政治极化背景下,掌握行政权的总统提出的法案很难在国会获得通过,所谓“制衡体制”变成了“否决型体制”,造成严重内耗,甚至导致灾难性的政治僵局和政治瘫痪,影响国家治理效能。比如,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许多政策,都遭到国会的掣肘,出台“慢半拍”;在共和党控制的“红色州”与民主党控制的“蓝色州”极化更加固化的情况下,联邦政府的疫情应对政策遭到反对党控制的一些地方政府的抵制和消解。

政治极化还使美国公共政策缺乏延续性。过去,美国两党政策虽然存在差异,但相对不大,政党轮番后,执政党还能执行前任政府的一些政策举措,公共政策还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但严重的政治极化,造成两党政策差异越来越大。政党轮番后,执政党往往推翻前任政府许多重大政策,造成公共政策的反复“翻烧饼”。比如,共和党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几乎推翻了前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推出的所有重大公共决策。同样,特朗普推行的诸如医改、美墨边境建墙、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在民主党总统拜登上任后又遭到了废止。公共政策的反复调整,给国家治理带来严重资源损耗,给民众带来诸多不便,也直接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作者系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扫描二维码 查看理论版更多内容